

「中日戰爭衝擊下的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侯嘉星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2015 年 12 月 19 至 20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舉辦「中日戰爭衝擊下的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邀集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印度、緬甸、越南、馬來西亞、俄羅斯、香港、臺灣等十四個地區的學者共濟一堂，參與會議者包括多位青年學者，充分顯示二戰史持續受到學界關注，不斷有新血加入。為期 2 天的會議，共發表論文 59 篇，另國內亦有近百位專家學者、研究生報名參加，可說為近代史研究之一大盛事。時值抗戰勝利 70 週年，本次會議所展現企圖跨越國界與民族意識的視角，在諸多會議中特具新意。

會議緣起

本次會議係「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的第六次會議，係 2000 年時由哈佛大學教授 Ezra F. Vogel、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山田辰雄，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天石共同倡議發起。2002 年首度在哈佛大學召開會議，近史所 2013 年正式加入該學會，今年首度移師臺灣主辦，是國內學界抗戰史研究與國際對話的難得機會。近史所所長呂妙芬致開幕詞時特別提到，希望用亞洲史的視角來看待戰爭衝擊，過去對於戰爭的歷史記憶難免有許多分歧，但人們體認到邁向和解的崇高目標是多層次學術對話之一環，在現代國際社會發展中，歷史學者對事實的互動溝

通極為重要。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Hans van de Ven 特別談到，15 年前西方學術界對中日戰爭的研究可說一片空白，隨著共同研究的推動，如今方興未艾，現在國際學界逐漸重視也彼此對話，這是深為可喜的趨勢。

同樣地，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也以親身經歷，指出戰爭發生的種種悲劇，是現代難以想像，所以人類社會應體認不該輕啟戰端。而戰爭的影響也不僅止交戰雙方，中日兩國歷經民族與民主的衝擊，亞洲各地曾為殖民地之國家在戰爭中的種種經驗，這些都是中日戰爭研究未來值得進一步注意的課題。山田辰雄則談到，共同研究會議過去關注的主題有 5 類，分別是戰爭中的地域政治、軍事史研究、戰時文化與生活、戰時與戰後國際關係，以及戰爭與經濟發展等幾個面向。而此次會議除了延續這些議題外，也嘗試開發過去學界較少注意到的宗教、婦女與民族等議題，以下即區分為戰爭與決策、戰爭的地域研究、戰爭前後國際關係、戰爭之經濟與社會、戰後投降與處理以及戰爭的新議題等 6 項，依次記述會議發表論文與概要。

會議綜述

戰爭與決策是抗戰研究的傳統領域，也是政治軍事史的一環，此次會議即安排「國民政府的決策與組織」、「戰爭與情報」兩場討論，前者屬於政治史範疇，後者則

是軍事史專題。兩場討論會發表論文共有 8 篇，首先在「國民政府的決策與組織」討論會中報告了〈侍從室與戰時中國的軍事〉（張瑞德）、〈日機大轟炸及其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楊天石）、〈抗戰史事的「自述」與「他述」——以戰時粵系軍人相關的幾則史事為例〉（左雙文）、〈抗戰時期到戰後的南京、重慶《中央日報》與國民政府——走向自立的過程〉（中村元哉）、〈戰後中國的憲政轉型與警管區制〉（吉見崇）等 5 篇論文。以張瑞德的報告為例，特別指出儘管侍從室參與秘密軍事行動方面，包括聯繫與化解兩廣事變、抗戰初期運作緝拿韓復榘、策畫花園口決堤、規劃突襲延安行動等，部分課題過去已有研究，但隨著新材料的利用，本文提出新觀點與解釋，充分顯示抗戰研究的傳統領域隨著新資料的發掘，也能不斷推陳出新。

至於「戰爭與情報」的課題，自 2012 年國史館推出《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後相關研究陸續出現，本次會議的〈1938-1940 年新四軍致國民政府戰報檔案研究〉（馬振犢）、〈軍統局在香港淪陷前的情報工作〉（吳淑鳳）以及〈論抗戰前蘇聯軍事情報局在華對俄僑民之工作〉（安德）等三文利用大陸、臺灣及俄羅斯等方面的史料，是近年來戰爭與情報研究的一大盛會。過去抗戰史研究大量聚焦於軍事史與政治史，本次會議關於這些傳統課題也利用新檔案提出新見解，並注意到檔案或情報

資料所呈現的戰果、戰力誇大問題，這些亦需要通過各個不同材料相互比對，才能有更清楚的認識。通過本次共同研究的努力，特別是匯聚了中、日、俄等不同國家的研究者的資源，可以期待對於釐清舊課題有很大幫助。

而除了政治與軍事外，另一個抗戰史研究長期關注的課題則是以區域史為核心的討論，恰與以中央為主的政治軍事呈現互補。此次會議中共有 4 場與區域研究有關的討論會，分別是「東北亞地緣政治」、「四川、重慶與大後方」、「地方與中日戰爭」以及「1937 年的南京」等，所討論的具體地方包括東北、華北、四川及南京等處，可說已涵蓋了大半個中國。

有關戰爭與區域研究的討論會共發表 9 篇文章，首先在「東北亞地緣政治」中，3 篇文章〈中國東北的基礎建設與日本，1931-1945〉（陳慈玉）、〈國民政府對韓國臨時政府還國問題的對應——終戰前後時期重建東北亞國際秩序的一個側面〉（裴京漢）、〈戰後東北亞地區重建勢力範圍和東北抗日聯軍的角色〉（鄭炯兒），均以東北亞戰前至戰後的變化為中心。以陳慈玉的研究為例，日本在東北的經濟建設與其統治及支持戰爭密不可分，不但為中國留下可觀的影響，對這些人才戰後日本國內的走向亦有相當作用，這種「遺產」可說是雙方共同的。此一觀點在裴京漢、鄭炯兒的研究中也反覆出現，可說是 3 位學者共同的認知，也

是對戰爭研究視角的一大啟示。

「四川、重慶與大後方」由周勇、朱煜分別報告〈美國人眼中的中日戰爭——對美國奧斯卡獲獎影片〉、〈民眾教育館與抗戰建國——以抗戰大後方四川省和重慶市為中心〉等 2 篇文章。「地方與中日戰爭」則有林志宏、黃自進先後討論〈地方分權與「自治」：滿洲國的建立及日本支配〉、〈前哨戰的政治外交：中日兩國在華北的角逐（1933-1935）〉等論文。至於「1937 年的南京」，同樣有〈基督的力量：南京大屠殺期間難民的宗教生活〉（張連紅）以及〈南京大屠殺問題解決的困難與可能〉（程兆奇）等 2 篇論文。以上 6 篇論文中著重地方的戰爭觀點，以黃自進的研究為例，多次強調華北在近代日本觀念中始終不是國民政府的統治區，故若分別以「政權」及「國家」兩種觀點來看華北問題，會發現此一區域充滿著「一個華北，各自表述」的可能，這種矛盾也是中日戰爭爆發的線索之一。同時，黃自進特別談到這種地方軍政人物如宋哲元、張自忠等人的研究，很大程度被貼上民族英雄的標籤而難以細究其作為，但若回到當時脈絡，這些地方實力派軍人或許很大程度是為自己的前途打算。所以破除民族神話，使「時無英雄」或許也是未來中日戰爭研究努力方向之一。因此經由戰爭與區域研究的 4 場討論會可以發現到，這種中央與地方、民族主義與地方主義的拉扯，彼此之間視角落差，或許也是中日戰爭史研究需特別

注意之處。擴而言之，若將這種不同地域的視野拓展超越國界，則成了戰時與戰後國際關係之討論，亦向為史學家所注意。

本次會議企圖在亞洲史視角下討論中日戰爭之衝擊，所以國際關係之研究也深受各方注目。在「中日、日中關係的新視野」、「西方勢力與東亞外交」、「日本、華僑與東南亞關係」等3場討論會中共有來自美國、日本、馬來西亞、越南、大陸及臺灣等不同國家地區的學者，發表12篇論文。「中日、日中關係的新視野」中發表論文4篇，分別是〈「中國問題」をめぐる日本の對應と蔣介石の反應——日米交渉の事例から見る戦争擴大の主要因〉（鹿錫俊）、〈太平洋戦争末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對中和平構想〉（戸部良一）、〈國民政府對日和約草案解析〉（段瑞聰）、〈戦争終末期の日中戦争と日ソ關係——「日中ソ」提攜構想をめぐる〉（波多野澄雄）等。該討論會所關注的，是以中日問題為核心的國際關係，但也能注意到雙方及美國以外蘇聯的關鍵影響。不過主持人 Barak Kushner 特別指出，過去這些研究經常建立在美國資料上，深受某種意義上的「美國觀點」所影響，因此在研究中開發新材料，尤其是各國檔案公布以及各類私人文書披露，將是能否突破此限制的關鍵。

「西方勢力與東亞外交」則由李君山、Stephen R. MacKinnon 及吳景平分別宣讀〈1937年九國公約布魯塞爾會議之探

討〉、「Post-war China-U. S. Relations: The Other China Lobby」、〈戰時外交體制之得失——以宋子文為中心〉。三文在傳統外交史的基礎上考慮戰爭的因素，特別是若將戰爭與外交同樣做為達成政治目的之手段，那麼捲入期間的各大國如何處理此間分際，這是在本次會議中注意到且未來能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作為「革命之母」的華僑群體在戰爭中的角色也同樣受到重視，「日本、華僑與東南亞關係」宣讀5篇論文，分別是〈日中戦争前期の華僑政策——華僑への注目と重慶國民政府との關係切斷〉（Vo Minh Vu）、〈日本占領南洋期間臺灣人的形象和行動：南洋華僑的觀點〉（李盈慧）、〈抗日戦争時期新馬華社領袖的回應：以陳嘉庚和陳禎祿為例〉（陳中和）、〈第二次大戰前日本與法國對法屬印度支那的交渉〉（許文堂）以及〈中日大戰在緬甸與當地華僑華人（1942-1945）〉（朱泓源）等，最大的特徵是將華僑的視野由過去聚焦於新馬等地，擴大到緬甸、越南，這無疑地也大幅增加離散社群研究的可能性。此次有關國際關係的3場討論會中開發許多過去國內學界較少關注的新材料，包括日本、緬甸、越南等處皆有所涉及，這也是希望形成「亞洲史」視角國際關係的關鍵。

而同樣利用跨國新史料進行的，另有針對戰時經濟社會問題的討論。此次會議分別以「東亞經貿互動與變遷」、「學人與戰

爭」及「戰爭、宗教與生活」三個角度分別觀察戰爭與經濟、文化和宗教等社會生活的種種面貌。首先在「東亞經貿互動與變遷」中報告 4 篇精彩的文章，分別是〈一九三〇年代兩個穀物圈與亞洲經濟秩序——小麥與稻米為中心的觀察〉（李宇平）、〈汪精衛政府總稅務司岸本廣吉（1942-1945）〉（張志雲）、〈中日戰爭後中國的稅政與工商同業公會——以上海的貨物稅制度為素材〉（金子肇）、〈1940-50 年代的中國經濟與日中關係〉（久保亨）。這 4 篇文章涵蓋戰前、戰時與戰後的經濟活動，戰前的貿易活動中李宇平注意到 1930 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發生在工業先進國，但經濟恐慌也波及到邊陲的半工業化國家，所以由米麥貿易流動或可看到這種衝擊的影響。戰時的活動，張志雲則以岸本廣吉為例，指出日籍關員執掌時期，一定程度強化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其對海關制度的影響可說僅次於赫德。金子肇以貨物稅為線索串連戰時與戰後的經濟變遷，特別指出國府在缺乏財源的情況下擴徵貨物稅，但又沒有足夠的規範，導致弊端叢生，這是內戰爆發及局勢逆轉的原因之一。久保亨則以機器為例討論中日技術交流，認為戰爭中因為雙方關係的中斷，中國開啟一波技術自給的潮流，戰後透過留用日本技術人員及接收日資設備獲得一定發展；而本該於 1950 年代有所發展的雙方合作，卻在冷戰及國際局勢下受到遏止。

再者，除了商人參與戰爭外，學術界、

宗教界等社會各層面也不能自外其身，「學人與戰爭」的討論中，水羽信男及許治英分別報告〈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國際情勢觀：以 1945 年前後為中心〉、〈國難時期胡適對和戰問題的看法〉。「戰爭、宗教與生活」中則有學愚與 Brooks Jessup 分別以“Buddhist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ism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1931-1945)”和“Regenerating the Dharma: Buddhist Activism and Civic Culture in Postwar Shanghai, 1945-1947”為題討論戰爭與宗教群體的關係。水羽信男以西南大學的「戰國策派」學者為中心，討論他們如何看待戰後國際關係；許治英則以胡適的滿州國觀點出發，探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和戰抉擇。學愚則以戰時佛教動員而產生的「佛教民族主義」為線索，指出其影響甚至延續到韓戰時期；Brooks Jessup 則探討戰後的人間佛教如何協助重建，並積極參與上海城市管理的各個層面。這些研究均共同指出，戰爭無疑地對經濟、文化帶來重大影響，這種社會各層面的複雜歷史脈絡交織，這也是本次會議以「衝擊」為名的意義。通過 3 場有關討論可以發現，從戰爭到戰後的變化極為關鍵，如何將戰爭動員順利轉型為戰後穩定社會是一大難題，所以從戰爭投降到戰後處理便值得特別注意。

如何從戰爭過渡到戰後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歷史經驗顯示國民政府處置失當的結果，付出之代價是為此失去政權。本次會議

「日本投降與中國」、「戰後遣返、留用與復員」及「戰犯與戰爭責任」等各場共 11 篇論文。「日本投降與中國」所談的 4 篇論文分別是“Japan's Surrender in China 9-9-9”（Hans van de Ven），“Flowing East in Victory”（Diana Lary），“A Complicated Request: Student Letters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t the End of Nationalist Rule in Mainland China (1945-1949)”（Aaron William Moore）、〈如今戰爭已經結束——以留華日本科技人員為中心〉（楊大慶）。其中 Hans van de Ven 談到受降之際日方與中方的種種考量，日方希望與國府合作支持中國抗拒美國帝國主義，對國府而言受降是其政治資源，也是必須把握來改善國內外政治局勢的不利局面。Diana Lary 其中文標題「勝利東流」饒富雙關意涵，關心的是因戰爭而遷移的數千萬人口，其戰後的處境。這些是過去較少注意到的問題。

「戰後遣返、留用與復員」則有〈国共内戦下の戦後日中提携——支那派遣軍と国民政府〉（加藤聖文）、〈旧帝国圏における日本人の遺骨処理と慰霊——台湾を中心として〉（浜井和史）、〈抗戰結束後中國國營企業的日本技術人員留用〉（金志煥）等課題。加藤聖文認為戰後中國對日本的溫和態度，使之與日本國內反共思想、保守派內的親臺灣派結合，共同形成戰後中日關係的基盤。但與之相對的，浜井從過去少見的遺骨案例出發，認為臺灣當局希

望盡力減低殖民記憶而有許多限制，故對日本在臺的遺骨及墓園問題遲遲未處理。金志煥討論留用人員對經濟穩定的影響，以中國紡織公司為例，認為國府留用技術人員是為了增進生產維持統治。然而久保亨特別提醒，同樣以紡織工業為例，中國技術人員也有不錯的技術，但如鞍山鋼鐵廠則缺乏優良的中國技術人員，故全賴日本技術人員維持，所以可能需要考慮不同地方中國技術人員分布不均的問題。另外這些紀錄也可能對日本技術人員評價過高，部分當時紀錄顯示，中國人員與日本人員素質落差並不大，所以材料的片面性需要考慮。

至於「戰犯與戰爭責任」問題，Barak Kushner、大澤武司、蘇智良及潘洵分別報告“Legality and Empire—the Struggle over ‘Justic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44-1947)”、〈中華人民共和國の日本人戦犯裁判——中國外交部檔案が語るその過程と意義〉、〈「慰安婦」問題與日本の歴史責任〉以及〈恐怖與毀滅：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的演進及損害〉等。其中 Barak Kushner 談到審判的「正義」追求與當時中國及東亞各國之間立場的落差，彼此間相互妥協，最終也影響戰後中日關係。值得一提的是，3 場討論會發表各篇論文均注意到戰爭與戰後處理的種種複雜困難問題，無論是對戰爭罪與正義的追求，或是基於現實需要而留用技術人員等，都需要回歸當時脈絡來思考。而對這些戰後種種處置方式的討論，

又攸關今日戰爭各國邁向和解的契機。

除了前述從政治、軍事、國際關係、經濟以及社會等各個角度來討論戰爭之影響外，本次會議也開發許多新課題值得注意。包括「戰爭與婦女角色」、「戰後的民族問題、殖民主義與中國的視角」及「抗戰時期的國族建構」等各場，涉及婦女與民族認同的問題。「戰爭與婦女角色」“From WWII to the Civil War: Women and 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the Chongqing Region, 1944-46”（Li Danke）、〈戰爭中的陰雲：陪都婦女福利社社會工作的一個考察〉（柯惠鈴）、〈困守大後方：抗戰時期宋美齡的重慶歲月〉（張瑾）。游鑑明綜合評論時指出，3 篇文章在空間上皆以「重慶」為核心，涉及的史料包括檔案、書信日記等也頗為豐富，但重慶婦女組織或許應與滿州國、日本占領區、中共控制區、臺灣乃至朝鮮與日本相比較，或可使之與戰爭衝擊下的亞洲有更多共鳴。的確，這些課題若與前述「四川、重慶與大後方」討論地域視野的各篇論文相比較，更能看出以人物為主角的研究中，存在著地緣、性別等種種複雜立場，辨析史料中這些立場的影響，將使抗戰研究更為深刻。

關於民族問題則有〈臺灣原住民的白色恐怖——泰雅族省議員林瑞昌為例〉（傅琪貽）、〈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民政府的東南亞戰略：以戰後構想為中心〉（藤井元博）、“The Impact of Post Sino-

Japanese War o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Myanmar”（Kyaw Swe Nyunt）、〈重慶當局對戰後寮國的規畫與實踐〉（王文隆）、“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a and Japanese leaders during the World Wars : Implications for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Ranjana Mukhopadhyaya）、〈戰爭、民族與國家——抗戰前後雲南土司的困境與抉擇：1942-1952〉（吳啟訥）等 6 篇文章。這些研究大抵注意到中國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如藤井元博討論緬北問題、王文隆研究寮國的外交規劃、Ranjana Mukhopadhyaya 聚焦於中印關係等，也都共同注意到中日戰爭對整個亞洲都有影響。

此外，與民族議題有關的則是國族建構的課題，「抗戰時期的國族建構」討論會分別由潘光哲、若松大祐報告〈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的「屈原問題」：建構「愛國文化」〉、〈國家所公示的國族歷史：蔣中正《中國之命運》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2 篇論文。以潘光哲的研究為例，他以屈原為例，指出戰爭與「愛國文化」的建構之關連，進而闡釋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如何形成，因認識論的斷裂，產生不同時代的「屈原」會有不同定位，顯現其複雜性。

整體而言，本次會議 18 個討論場次所涵蓋的議題，除了延續傳統關於戰爭時期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外，對於宗教、婦女和民族問題也多有涉及。同樣地，中日戰

爭的研究超越了中日當事兩國，廣及全亞洲，更恰當反映了這場戰爭的衝擊與影響。而對於「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未來的展望與思考，則成為與會學者們關心討論的主題。

會議展望

會議綜合討論中，Hans van de Ven 於引言時首先提出對於「勝利」的思考，認為絕對的勝利與主導戰後新秩序有密切之因果關係，歷史上種種例子都顯示政治上的成功，必須基於軍事上的絕對勝利，所以1945年中國缺乏決定性的「勝利」是否是真正的勝利？甚或是勝利之中的失敗，從而導致1949年的變局。

久保亨指出中日戰爭不僅是中日兩國的事情，還有臺灣、朝鮮、東南亞及印度的視野討論。戰爭不僅影響中國與日本，也影響亞洲的面貌，本次會議在開拓亞洲視野的努力，值得肯定。而且戰爭中對人的傷害、對社會的衝擊也十分值得探討。他也談到近十五年來的上課經驗，許多日本學生認為日本是戰爭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所以共同研究會議多年來的努力成果，讓更多日本人注意到這個情況，更進一步認清歷史。過去對於歷史認知的不同，臺灣、日本、亞洲或歐洲等不同地區的人皆有不同的看法，如何調和彼此間的不同，是歷史學家的責任。對日本而言，如同其他國家研究本國史者必然占多數，而研究本國史者又不免基於本位主義

來詮釋歷史，所以中日戰爭史也如此。放大到亞洲範圍這個問題更為複雜，所以未來有機會更進一步討論。

潘光哲則提出新觀點與新材料的利用究竟目的何在？指出歷史研究其實是回歸脈絡的過程，對抗的是去脈絡化之歷史書寫以及僅僅留下片面印象的歷史記憶。本次會議注意到過去很少注意到的層面，提出在脈絡中觀察亞洲國家、從戰爭到戰後的變化觀察，可謂入乎其內而又出乎其外，超越意識形態之束縛，打開研究者的視野。在會議中可以看到宗教與戰爭、戰爭與婦女等等，所展現的不僅是民族國家的觀點，而是超越民族國界彼此共同體認戰爭之衝擊與影響。未來臺灣亦希望藉此機會，超越困於臺灣內部的觀點。最後周勇則藉由紀錄片《大後方》討論了影像在史學中的運用，通過這些努力，將使學術研究更有機會面向社會大眾。

總而言之，如同楊天石於開幕致詞及綜合座談時語重心長地強調，中日戰爭的研究要走向跨越國界、跨越政治或意識形態的限制，要超越兩岸「一個抗戰，各自表述」的現況。本次會議希望討論戰爭衝擊下的亞洲，試圖廣泛納入亞洲各國家的視角，真正達到共享史料與共同研究的目的。最終亦能呼應共同研究會議於開幕時揭櫫的理想：儘管目前關於中日戰爭的記憶和詮釋仍然有許多紛歧、也有不易溝通之處，但彼此願意正視歷史之真實與重要，也彼此願意共同研究、共同對話，如此更有機會邁向和解。